

# 鲁迅与“左联”的书刊出版

□张元珂

发行是“左联”向外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左翼话语权力所常用的出版书籍或发表文章的策略。像袁殊主办的《文艺新闻》、施蛰存主办的《现代》、巴金等人主办的《水星》、晨报副刊、申报副刊、良友画报等报刊，都曾成为左翼文学发表的园地。“左联”书刊的出版、发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其顽强的生命力及传播效果，也在中外传播史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左联”期刊受众读者欢迎的程度，也是书刊出版史上少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不仅以其创作深深影响了左翼文坛，也以其资深作家的号召力和卓越的书刊策划能力和出版策略，对“左联”的书刊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及其政府制定、颁布了极为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设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关，对带有左翼倾向，甚至同情革命的书刊进行了严厉的查处、惩罚。民国报人史良才的被杀足以证明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管制的严厉程度。鲁迅超拔于他人的前卫思想，在书刊出版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他比“左联”的周扬派们更有效拓展宣传阵地。

以笔名代替真名。鲁迅为躲避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常常采用笔名发表文章，甚至一篇一个笔名，从而有效躲过了一次次审查。这在文章发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鲁迅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许多杂文，用的全是笔名。1933年和1934年用笔名最多，这也和国民党的极端文化审查制度有关。“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学者最新考证，鲁迅一生共用笔名达150多个，每个笔名都颇为讲究，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引申义。（周清叶：《关于鲁迅笔名的研究》）

以翻译代替创作。鲁迅与野草书屋、联华书局、同文书局、兴中书局、现代书局等书局合作，以“文丛”或“译丛”形式，亲自翻译或主持了大量译著的出版。在经济效益和文学价值之间，在审美意识和文学影响之间，鲁迅更看重后者，因此，他并不斤斤计较译著的版权，基本相当于自费出版，目的无非是：以翻译代替写作，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而且，这些翻译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手法、大都和译者本人的艺术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鲁迅对俄国、日本及东北欧等国家反映现实、反抗压迫与专制，尤其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翻译的《死魂灵》（果戈理）《表》（班台莱耶夫）《毁灭》（法捷耶夫）等作品备受各层次读者欢迎。《表》1935年7月由生活出版社出版，截止1937年2月已再版四次。1948年9月生活出版社又再版5000册，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一次印刷1万册，其备受喜爱程度可见一斑。另外，鲁迅还陆续发表了《关于翻译的通信》《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上、下）《论重译》《非有复译不可》等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章，批评了

“信达雅”的理论，主张“直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以求“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而且，其译作的思想内容也直指旧中国的现实。这都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动选择那些与1930年代中国现实生活具有极强针对性的作家作品。在文化极端专制情况下，他们以翻译外国作品的形式继续进行着创作，不但表征了左翼文学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表现了优秀的“左联”作家对“中国问题”深刻的思考力。

以主编或参编的期刊为阵地，及时发表文章。“左联”成立前后，鲁迅曾经主编《巴尔底山》《萌芽》《奔流》《文艺研究》等刊物，支持或参编《拓荒者》《文学》《文学导报》《世界文化》《译文》《海燕》等期刊，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大力介绍苏俄文艺理论、文艺作品。他着手翻译并在《奔流》上刊载《苏俄的文艺政策》，在《萌芽》上发表译作《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日本 岩崎昶），连载法捷耶夫的《毁灭》（即《毁灭》），《“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流氓的变迁》等极富影响的理论文章、杂文也在《萌芽》上刊载。《海燕》于1936年1月20日创刊于上海，鲁迅亲自题写刊名，其小说《出关》、散文《阿金》和杂文《“题未定”草》等文章在该刊发表。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章或书籍从来不乏读者，所以，各大期刊、书店、书局、出版社都愿意发表他的文章，出版他的书籍，以获取利润。《海燕》创刊号（1936年1月20日出版，“海燕”二字为鲁迅题写）首印2000册当日即卖完，后又经读者要求，不得不再版加印。《文学》月刊（创刊号）一版迅速销售完毕，后又再版，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购买力，后又三版，竟然达到六版，其销售之红火可见一斑（祝寿臣：《创刊号一版再版了五六次的刊物——〈文学〉》、《新闻与写作》）。这样的销售业绩与鲁迅的参与及其作品的刊登，是有着重要的关系的。

以个人影响力促进图书出版。(1)“奴隶丛书”的出版。《丰收》（叶紫）《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萧红）组成“奴隶文丛”。以“奴隶社”的名义，由鲁迅作序并资助自费出版。这三部书分别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之二、之三，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一方面，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左联”内部某些党团领导者的“奴隶总比奴才强”，“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的很，非常小心”。另一方面，也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文化专制：“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2)《草鞋脚》的出版。1934年，鲁迅和茅盾邀请美国记者伊罗生之委托，编选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小说选集，命名为《草鞋脚》。由他俩共同选择篇目，鲁迅亲自为小说集作序，并题了书名，茅盾写了《〈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巴金、冰心、张天翼、艾芜、沙汀、丁玲、葛琴、魏金枝、吴组细、草明、欧阳山、

# 鲁迅关心左翼文艺青年的历史见证

□葛 涛

由先生介绍新波先生给我刻了十二幅。

1935年1月9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有一家新开的书店，想将先生《二心集》的被检察掉的部份，另出一书，请我征求先生的同意。随后见到先生，他对我说：那一部分文章，他要自己将它印刷出来。因为那是经监察员们一一挑选过的，书名最好是用《二心集精华》。但这本书后来终于没有印出。

1935年2月26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小说稿”也是指《丰收》，我请先生送给茅盾先生去看一看，改一改。“交回来”是由茅先生那里交回来的。插画是指新波先生所刻的那十二幅画。

先生平常写信，总是用“时安”或“时绥”的。这回用了“刻安”，所以加了那一个小注解。

1935年7月30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我写一信给先生，说我已经挨饿了。请他（一）问问郑振铎先生，我那篇中篇小说《星》怎样了？（那小说由先生介绍给郑、章合编的《文学季刊》）？（二）内山书店的《丰收》可不可以算一算账？（三）如果上列上二项都无办法，就请他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

1935年9月23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郑”是指郑振铎先生。小说即《星》，登在《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内。

1935年11月25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看文章”是《星》刊出了，请他代我看一看。我告诉他：我近来一个字文章都写不出，又丢了。总是写不成……我想休息一下（一星期或半个月）再写。

“选集”是日译的《鲁迅选集》，其他两本是什么书，现在忘记了。1935年12月22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上海有几种“狗报”，专门攻击“奴隶丛书”三本小说，并且将三位作者的姓名，籍贯及出身，统统公布了出来，其中关于我的部份写得特别详细，而且多错误。这是因为我上海的某一家报馆做过一年副刊编辑的原故。

《漫画和生活》是张谭和黄士英两先生主编的。《殖民地问题》是吴清友先生的大著。

1936年10月6日鲁迅致咏沫兰信的说明：这是先生给我女人的信（离先生去世仅十三天），那时我正患着肺结核和温性肋膜炎，住在医院里。

叶紫所撰写的这几封鲁迅书信的说明文字，对于了解鲁迅这几封书信的写作背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中不仅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叶紫在文学上的指导和提携，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叶紫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另外，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最初准备把《二心集》删掉的文章重新以《二心集精华》为名出版这一历史细节。

青年木刻家唐诃对鲁迅来信的说明

唐诃（1913—1984）原名田际华，是左翼木刻

鲁迅是“左联”的盟主，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无人能替代。“左联”中的三派人——太阳社与创造社同仁、鲁迅及其追随者、少量中间派或同情革命的自由作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不是简单地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和斗争需要而走在一起的，而是这个组织自身以文学的名义所展现出来的彰显弱者权利、反抗政府专制、预示新的未来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感召力。这尤其对那些落魄的、流亡的、底层的青年作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鲁迅的存在，这一切都会大打折扣。鲁迅对国民党所推行的文化专制及其文化官僚、文人帮凶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也非常厌恶“左联”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小圈子主义、教条主义素有反感。他不赞同“左联”以党团组织的名义大搞张贴标语、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认为那样的结果必然是暴露自己、削弱力量。不过，他把前者看作敌人，要像痛打落水的叭儿狗那样，不留一点情面；把后者看作友人，以最大的诚意和最持久的耐心，最大范围的结成联合战线。如果没有鲁迅，“左联”的这个凝聚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

关于鲁迅晚年的处境，很多学者都认为他处于孤立状态，如果将之放置于“左联”这个团体内，这大体符合事实。从鲁迅书信、杂文中可知，他对以“四条汉子”（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处事方式，特别是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做法极为反感。鲁迅曾对这一派年轻人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创造社、太阳社骨干成员对他尖锐的批判，周扬派对他无原则地孤立，都曾让他感到事态的凄凉，遂对他们的做法颇感失望。晚年，他在书信中称他们为“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己则是“苦工”和“奴隶”，其愤怒与失望可见一斑。晚年，他只与萧军、萧红、胡风、叶紫、冯雪峰等少数几个年轻人保持着来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就成了孤家寡人，只在“左联”这一亩三分地上进行绝望的抗争。如果这么认为，我们似乎没有读懂鲁迅。他的眼界、学识远超一般人，他的立足点也不绝不会在一党一派，他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与质疑找寻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这一点，正如陈思和所分析的：“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奋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的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加盟于《新青年》，后来又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最后又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责任，成为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鲁迅总是寻找到社会上最有活力、最有革命性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的思想之前卫可能已经超越了那些思潮，但他仍然愿意与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结为盟友，共同担负起战斗的责任。”（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即使到了1936年鲁迅逝世前，他对盟友的寻找也一刻没有止息。他在左翼阵营内发现了萧军、萧红、叶紫、胡风等可以信任的年轻人，在“左联”组织外找到了巴金、赵家璧、黎烈文、黄源、吴郎西、孟十还、章靳以等年轻作家。如果鲁迅不过早去世，他们可能结成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力量的统一战线。

“左联”的书刊出版系统非常复杂，其书籍与期刊的种类、风格、发行渠道等等各不相同。“左联”的书刊发行根据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公开、秘密、隐蔽、合作等四种方式。公开发行的“左联”的书刊，是带有极大危险性的；秘密发行的大都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比如《秘书处消息》（左联秘书处主办）、《文学生活》（胡风主编），其发行面较窄，只在盟员或友人家发行、传阅，故影响较小；隐蔽发行是左联书刊出版的常态，或者采取更换刊名，或者虚拟出版社名称，以躲避当局者的检查；合作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1937年发出了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准备出版《鲁迅书简》一书。很多保存着鲁迅书信的人纷纷把手头的鲁迅书信寄给许广平，以此表达对鲁迅的怀念之情。这些致许广平的书信大部分都收入了海晏编辑的《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一书中，但还有一部分书信及收信人所写的关于鲁迅书信的说明没有被公开发表过。这些致许广平的书信及关于所收到的鲁迅书信的说明文字不仅提供了鲁迅关心和帮助左翼文艺青年的一些具体事实，而且对于了解鲁迅所写的一些书信的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青年作家叶紫对鲁迅来信的说明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是鲁迅扶持过的一位左翼作家，他不仅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小说，出版了收入“奴隶丛书”中的小说集《丰收》，成为20世纪30年代有代表性的左翼青年作家，而且他在生活困难时也多次得到鲁迅的经济援助，渡过了生活上的难关。

叶紫在看到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之后，在1937年4月15日写信给许广平，并把手头保存的鲁迅书信寄给许广平。叶紫在信中说：

从1933年的冬季起，我开始和豫先生（按：即鲁迅）通信，算到去年10月止，至少也应当有三四十封。但是我费了很多气力，翻箱倒篋，寻来寻去，只找到这八九页信纸，其中还有一页是不完全的。我记得最初和他的通信，因为种种方面的不便，大抵一看过就扯掉了，很少保留起来（其中也有和其他朋友有关的信，寄给或转给其他的朋友了）。我总以为，豫先生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谁知道不过三四年后的现在，就连我们中的一个亲笔字也不可得了呢！唉！这几页信纸上每一笔一画，是如何的宝贵啊！我后悔我当时为什么不将那些信一页一页地留起来呢。

这里一共是10页，最后一页（离先生去世仅13天），是写给我女人的，另外还有一封长的，是我在医院时写给我的，那封信我看得很宝贵，收的好好的，但不知道给孩子们翻到哪里去了，怎么也寻不到。

这些信我不愿意收回来了，请先生代为好好保存吧。如果印出来，我都要一副本做纪念。注解我希望在付印时也能加进去。

叶紫转给许广平的这些鲁迅的书信后来被收入了《鲁迅全集》，但是叶紫给这些鲁迅书信所写的说明文字虽然有一部分内容被《鲁迅全集》收入了注释部分，但是全部文字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可以视为叶紫的佚文，所以全文转录如下：1935年1月4日鲁迅致叶紫信的说明（按：鲁迅书信略，下同）：这封信的后半页是回答我关于另一个朋友的话（大概是这封信，现在记不十分清楚了），我裁下来，寄给那位朋友了。那朋友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写信来要我转请先生给他们办的文艺社写一块招牌。先生回信给我，说他不能写：一者，是说他的字并不好，写招牌要请字写得漂亮的人写。二者，他写的招牌不但不能替文艺社生光，而且还有许多不便，甚至有害。三者，他希望中国的青年以后作事或研究文艺，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不要只在外表上出风头，图漂亮。招牌的用处是：只在指明这是什么地方而已……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书籍印出”是指我的习作《丰收》，“书店”是指内山书店。木刻招牌因铁耕先生不能，后来仍

丘东平等左翼青年作家或进步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部书一直搁置了近50年，才于1980年11月在北京出版。茅盾在他逝世前的9个月，还为《草鞋脚》写了新的序言。(3)鲁迅和内山完造私交甚厚，内山书店为鲁迅出版了很多书。1930年，鲁迅依托上海神州国光社，亲自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该书店还发行当时被禁售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铁流》等6种文学读物。(4)“现代文艺丛书”的出版，该丛书由鲁迅担任主编，上海神光书局出版，原定为10本：《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基作，柔石译；《被解放的堂·吉珂德》，A.卢那卡尔斯基作，鲁迅译；《十月》等，但是，后来由于“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害怕了。”（《铁流》编校后记），所以，该丛书只出了四种：剧本《浮士德与城》柔石译，1930年9月版；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贺非译等。(5)“文艺连丛”的出版。该文丛均为译本，联华书局出版，原计划有：曹清华《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苏联 聂维诺夫 ）、易嘉（瞿秋白）的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珂德》（苏联 卢那卡尔斯基 等）。除了上述丛书之外，鲁迅还亲自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篇序言，内收33位作者的59篇作品。1934年又和郑振铎合编“版画丛刊”，为美术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版画也多为现实主义作品，也有其鲜明的现实考虑。

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80，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提出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如果以此来分析鲁迅在书刊传播中的角色功能，我们可以概括如下：以鲁迅及追随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合同情革命的进步作家、自由派作家，以期开、著作为主要传播媒介，以书店、出版社、报纸期刊社为主要活动空间，向上海这座城市里以小市民、大学生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和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青年，宣传他们批判黑暗社会、反抗文化专制、寻求社会进步的理念，从而达到了远超政治现实和媒介现实的高效率的传播效果。同时，“左联”期刊的存在及传播效果也符合拉斯韦尔对传播学三大功能的界定——“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左联”书刊所及之处，不但令当局感到恐慌，从而间接起到了监督与互动的政治目的，也有效整合了一切寻求进步、呼唤自由的文学团体。“左联”所创造的文学成就，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不但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至今，也是一笔值得好好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不过，“左联”书刊的出版与发行也有违传播学的经典定义，即它首先面向的不是“大众”，而且，信息源的发送与接收也没有规律可言。这一切都是由193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复杂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及犬牙交错的政治力量合力造成的。另外，传播学还有一个功能——娱乐功能，“左联”文人、左翼传统也在1990年代以来“全民娱乐”、“跑步向钱看”的市场化语境里，被彻底的游戏化了。比如，文学界陆续出现对经典作家重排名次现象，茅盾被排除出前十名，金庸被请上第2位的宝座；文学界假借“文学史重评”、“作家作品重评”的名义，企图完全否定左翼文学成绩；近些年来，一些媒体和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合谋，大炒私作鲁迅作品撤离语文教材事件……这些事件实际上都与传播学的第四大功能——娱乐功能有关，和作家、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等似乎并无多大关系。

个在天津工作的进步的青年（通讯地址是天津），不仅阅读鲁迅翻译的进步书籍《毁灭》，关注鲁迅编选的珂勒惠支的版画，还曾经因为思想进步而入狱（鲁迅致康小行的前两封书信都是被“三道头”即天津租界的外国警察抄没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注释鲁迅的这封书信，解决现行的《鲁迅全集》中对康小行这个人没有注释的问题。

“我们太不宝贵鲁迅先生了！”

鲁迅不仅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写作，而且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导青年作家、木刻家，乃至普通的青年读者，影响一大批的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缔造了一大批生力军。鲁迅在1932年4月29日所写的《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他在写作之外为青年作家校对著译的事情：

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图。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意思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鲁迅的上述话虽然是在1932年说的，但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仍然在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关心和帮助进步的青年作家、木刻家和普通的读者，上述的叶紫、唐诃和康小行三位青年致许广平的书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1939年10月19日，鲁迅遽然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当时正在医院中治疗的叶紫闻讯后在10月20日写下了悼诗《哭鲁迅先生》：

我患着肺结核和肋膜炎，他写信来，寄来一包钱，对我说：“青年人，不要急，安心静养，病自然会好的。”

但是，忽然地，朋友们来告诉我他的恶消息，于是我哭了起来。医生跑来对我说：“你底热度太高，你不能哭。”但是我怎能不哭呢！看跑起来对我说：“你底病很危险，我们不许你伤心，不许你哭。”但是我怎能不哭呢！我们不是死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友，而且失掉了伟大的民族底魂魄。这——我怎能不哭呢！

叶紫的这首诗中提到的自己在住院时得到鲁迅的经济资助和精神鼓励的事，就是指鲁迅在1936年10月6日致信叶紫的夫人咏沫兰并资助50元钱为正在住院治疗的叶紫救急的事。这首诗虽然只是写鲁迅对他的关心和他对鲁迅的怀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当时的左翼进步青年对鲁迅的热爱和尊敬：“我们不是死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友，而且失掉了伟大的民族底魂魄。”唐诃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自责为为了一些事情而求助鲁迅以至于占用了鲁迅的宝贵的时间，他说：“我们太不宝贵鲁迅先生了！”这句话也充分地表达了进步的青年对鲁迅逝世的无限的惋惜之情。可以说，鲁迅一生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指导和帮助进步的青年，为中国现代的左翼青年的成长和中国左翼文化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顺祝 时绥

唐诃 谨上  
二月廿五日

唐诃的这封信不仅对保存下来的四封鲁迅书信作了说明，提供了鲁迅这四封书信的写作背景，而且也提供了其他几封已经遗失的鲁迅书信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虽然简略，但是都提供了他和鲁迅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青年读者康小行对鲁迅来信的说明

康小行是天津的一个进步青年，他致信鲁迅，希望购买（凯·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正在患病中的鲁迅在1936年8月26日委托许广平回信说该书已经售完。康小行在看到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后，就在1937年2月28日把保存着的这封鲁迅书信寄给许广平，并在信中说明了自己和鲁迅书信来往的经过。

景东先生：

寄上鲁迅先生的信一通。这信虽短短地几句话，但在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以为应当寄给您保存。鲁迅先生对一个不相识的人，一件很小的事，都那样恳切，足见人格的伟大了。鲁迅先生一共给过我三次信。第一次远在九年前，创造社等“围剿”的时候。内容记不十分清楚了，大约是说那些那时自命革命文学家的人们，虽也有坚实的人在，但大多数是杂七杂八的人物，所以对他们是的不满的。至于，对无产阶级文学是没有反对的意愿之类的活。第二次是答复《毁灭》中的一个疑问。可惜那两封信都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中，不知所终了。现在想起，比我坐了几年冤狱还来的痛心！这封信和以往的笔迹是不相同。而且用钢笔写的，我疑惑或许不是鲁迅先生的亲笔？——如果是亲笔的话，那就归您保管吧。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因为没有查到康小行的相关资料，所以对康小行这个人的注释是“不详”。不过，从这封康小行致许广平的信中，大致可以看出鲁迅对普通青年读者关心：他在1928年到1936年之间曾经三次写信给普通的青年读者康小行，第一封信大概是应康小行的要求还谈到了他当时和创造社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的情况，第二封信是解答关于《毁灭》中的一个问题，第三封信是鲁迅在病中无法写信的情况下委托许广平代笔回信告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已经售完的信息。另外，从这封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康小行在和鲁迅通信时是一

“我们太不宝贵鲁迅先生了！”这句话一直在我悲哀的回忆中震荡。信用完后，希望仍然挂号寄了回来。前些日子，虽陆续寄上编辑的《文地》，请指正！（海上述